

# 史传、杂史和笔记小说的共生互动

——以王仁裕《王氏见闻录》为中心

蒲向明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甘肃 成县 742500)

【内容摘要】《王氏见闻录》和其他笔记小说一样,体现了史传、杂史和笔记小说的共生互动状态,其流传过程一直游离于文史之间,但诸本似有阙漏。从现存作品看,它从思想到艺术不只是赋予读者一个连贯的故事,而是对历史生活的第一度文学发现,对《王氏见闻录》版本流传、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表现出来的文史共生互动多层次体察,可以深化对其文学价值的重估。

【关键词】王仁裕 笔记小说 《王氏见闻录》 史传 杂史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7-0089-05

迄今为止,学界对王仁裕笔记小说创作的整体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对其笔记小说和史传杂史的共生因素注意不够。王仁裕很多笔记小说在创作时力图有可考的史实出处,这些史实通常是作者对耳闻目睹之事的记录,相对笔记小说来说,比较接近生活的本真。这些史传、杂史一旦作为笔记小说的情节基础,其意义就因作者的加工而发生变异。以王仁裕笔记小说《王氏见闻录》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王仁裕对史传、杂史的青睐,既缘乎其可新奇视听,又缘乎其昭示着某种生活哲理或道德教训。这样,其笔记小说建构的情节就成了杂史与文学意义的中介。在《王氏见闻录》里杂史不只是赋予读者一个连贯的故事,它实际上是对生活的第一度文学发现,并从而成为一个可以不断更新的认识层面。

—

《王氏见闻录》为宋代目录学和史志所著录,从宋人载录的情况看,其版本流传在宋末已经比较稀少。宋仁宗景祐至庆历年间官修的目录专书《崇文总目》著录《王氏见闻录》于史部“传记类”,而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其于史部“杂史类”并所附解题云:“晋王仁裕撰,记前蜀事。”由此可知,《王氏见闻录》应当撰成于五代后晋时,内

容则多记前蜀王氏政权时朝野事迹。《王氏见闻录》的作时,还可以从作品本身窥见蛛丝马迹。《广记》卷190引《王氏见闻》“温造”条云:“南梁人自尔累世不敢复叛。余二十年前职於斯,故老尚历历而记之矣。”查《广记》卷397引《玉堂闲话》“斗山观”条:“兴平有斗山观……仁裕辛巳岁,于斯为节度判官。”按此南梁或为兴元,该书应撰成于后晋天福年间。

从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二种著名私家藏书志皆不著录《王氏见闻录》情况看,该书在南宋民间的流传已经较为鲜见,《紺珠集》、《类说》不见摘引,显然存在着宋末《王氏见闻录》就已经散失、亡佚的可能,不大会有更晚流传该书的情况。至于《宋史·艺文志》的著录,显然是元末至正年间脱脱等编撰《宋史》时抄录了前代诸种书志,陈陈相因而已。另南宋绍兴中改定的佚名辑《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以及《宋史·艺文志》著录《王氏见闻录》于子部“小说家类”,联系前者诸书载录情况,该书被载录经历了由传记类——杂史类——小说家类的变化,反映了当时学界对其认识观念的逐步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由史传、杂史向文学作品本身的回归。

《王氏见闻录》所记主要是五代十国时王蜀政

\* 本文为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王仁裕笔记小说研究”(0721B-03)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蒲向明(1963-)男,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陇南文史研究。

权的社会现实,从现存的33条作品看,涉及地域在秦陇、歧梁、蜀地,即今汉中、天水、陇南和成都一带。以时间来划分,属梁、蜀时期者居多,有二十多条,其余为仁裕佐判王思同者3条,反映黄巢入长安前后者3条。从题材来看,涉及王蜀和秦陇间军阀斗争的故事占多数。有“王思同”条:

后唐少帝朝,清泰王起于岐阳,朝廷诏西京留守王思同统禁旅征之。王师西出之后,寻闻虜垒,雍京僚属日登西楼,望其捷书。忽一日,官僚凭槛西向,见羊马城上有二大蛇,东西以首相向,为从者辈遥掷弹丸以警之。于时一人掷中东蛇之脑,蜿蜒然堕于墙下,挺然不动。使人视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于穴巢之间。识者窃议之曰:“潞王乙巳生,统帅王公亦乙巳生,俱为蛇相,今东蛇中脑而卒,岂非王师不利乎?”未逾旬日,群帅叛归潞王,思同腹心都将王彦晖已下,并投岐城纳款。同单马而遁,竟没于王事焉。蛇亡之兆,得不明乎?

从这则笔记小说的内容看,作者对王思同任西京留守的过程是颇为熟悉的。《王氏见闻录》的多数作品应是作者在长安任西京留守判官时撰述的。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王思同移镇陇右,好文士,无贤不肖,必馆接贿遗,在秦州累年,边民怀惠,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仁裕应聘再度到兴元“任从事”。思同奉命讨伐董璋叛乱后,王仁裕留在长安,约有五六年的时间,使得他有充裕的时间去采访、调查。在《王氏见闻录》中,小说所要揭示的意义不是任由作者摆布的,它在与史事的先天联系中,蕴藏着对情节的制约与挑战。

《王氏见闻录》思想内容的“底层”是真人真事素材,内容涉及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以其亲身经历为后世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如“萧怀武”条云:

伪蜀有“寻事团”,亦曰“中团”,小院使萧怀武主之,盖军巡之职也。怀武自所团捕捉贼盗年多,官位甚隆,积金巨万,第宅亚于王侯,声色妓乐,为一时之冠。所管中团百余人,每人各养私名十余辈,或聚或散,人莫能别,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马医酒保,乞丐佣作,及贩卖童儿辈,并是其狗。民间有偶语者,宫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勋贵家,当庖看厩、御车执乐者,皆是其狗。公私动静,无不立达于怀武,是以人怀恐惧,常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怀武杀人不知其数,蜀破之初,有与己不相协,及积金藏镪之夫,日夜捕逐入院,尽杀之。冤枉之声,闻于街巷。……<sup>[1]</sup>

这则笔记小说记载了王建前蜀政权的特务组

织“寻事团”(“中团”)作为高压政治的产物,其监督民众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引人深思。这些史实,新旧《五代史》均无记载,清人《十国春秋》也鲜有收录。因其来自于作者的耳闻目睹,显现出极其可贵的史料价值,可补史之阙。

“王承休”条(《太平广记》卷241)长达4000多字,是现存《王氏见闻录》作品中篇什最长者,也是王仁裕笔记小说中容量最大的。蜀后主王衍沉湎酒色,贪图享乐,不思国事,任用“多以邪僻奸秽之事媚其主”的奸佞小人王承休为秦州节度使,其以秦州“多出国色”为诱惑,让王衍巡幸天水,导致了前蜀灭亡。作者经历了整个事件,以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之职参与其中,这是蜀亡前夕这段史实记述最为详尽的。《通鉴》据此而写,但已是十分简略。其中除保留了王仁裕自己的几首诗作外,还完整引述了前秦州节度使判官蒲禹卿叩马泣血的表奏,以劝谏蜀主王衍放弃巡游天水。该谏书所言“是多山足水之乡,即易动难安之地,麦积崖无可瞻恋,米谷峡何亚连知?路遇嗟山,程通怨水。秦穆圉马之地,隗嚣僭位之邦”,反映了当时天水“多山足水”的自然状况和麦积崖、米谷峡(今址不明)已经颇为驰名的情况。其中也刻画了几个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王衍的昏聩好色、王承休的祸国擅权、蒲禹卿的忠直忧国、王仁裕的酬唱附和、韩昭的奸邪凶狠等,都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这里,史事、情节和意义之间的关系经常为读者注意,但情节的作用往往被低估,史实成了关注的表象,这种小说自然就成了被改造的“杂史”,以致很长一段时期《王氏见闻录》被认为是杂史而非虚构为手段的笔记小说。

## 二

《王氏见闻录》的小说篇什作为经过过滤和阐释后的“杂史”,在史实、情节和意义诸方面都有较强的代表性。虽然它们在文学史上与同期作品相比并不一定都是最优秀的,但从篇幅、容量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在良莠不齐间穿行,也许更能揭示出何以用杂史本事能孕育同样笔记小说令人难忘的情节?况且,这些小说作品的容量都不也是太大,这都和作者生活经历及作品流传有关。

王仁裕(880~956),字德辇,唐秦州长道县汉阳川(今甘肃礼县石桥乡)人。其经历唐末五代仕宦生涯,晚年颇显赫,在文学上以诗和笔记小说名世。据史料记载,仁裕喜为诗,所作逾万首,有“诗窖子”之时誉,惜今所存诗较少。他的笔记小说主要有《开元天宝遗事》、《玉堂闲话》、《王氏见闻录》

等。就其现知三种笔记小说而言,《王氏见闻录》书名有不同书籍载录出现差异的现象,归纳起来,大致有《王氏见闻集》、《王氏闻见集》、《王氏见闻》、《见闻录》等数种。《崇文总目》云:“《王氏见闻集》三卷”。《通志略》杂史类作《王氏闻见集》,卷数同。《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宋志》小说类作《见闻录》,均题三卷。清顾怀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小说类,亦三卷,作《见闻录》。即便是征引《王氏见闻录》佚文最多的《太平广记》,或作《王氏见闻录》,或作《王氏见闻》等等。南宋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引作《王氏见闻》,南宋阙名《锦绣万花谷》引作《王氏闻见录》。其佚文还见宋司马光《通鉴考异》、明冯梦龙《古今谭概》和《情史》、明《永乐大典》等书。

《王氏见闻录》的辑佚工作,在上世纪初就开始了。最早为民国四年(1915)吴增祺编《旧小说》乙集自《广记》辑十五则,作为丛编之一的商务印书馆铅印平装本称《王氏见闻》,佚名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陈见微先生辑《王氏见闻录》32条佚文,后面有李剑国先生在《隋唐五代小说叙录》中辑佚文31条,并附考释,再有陈尚君先生辑《王氏见闻录》31条逸文<sup>①</sup>,但所辑似有漏遗。如《太平广记》卷第126“报应”类所收“萧怀武”条,注明“出《王氏见闻》”,但紧跟其后所收“李龟祜”条未标明出处,兹引如下:

乾德中,伪蜀御史李龟祜久居宪职。尝一日出至三井桥,忽睹十余人,推头及被发者,叫屈称冤,渐来相逼。龟祜惶惧,回马径归,说与妻子。仍诫其子曰:“尔等成长筮仕,慎勿为刑狱官,以吾清慎畏惧,犹有冤枉,今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sup>②</sup>本条笔记写前蜀监察御史李龟祜的离奇遭遇和戒子遗言,事件带有明显的生活化和传闻性质,据《通志》云《王氏见闻》“记前蜀事”的特点和仅居“萧怀武”则之后等诸方判断,应属《王氏见闻录》无疑。“李龟祜”条之后的“陈洁”条:

伪蜀御史陈洁,性惨毒,谳刑定狱,尝以深刻为务。十年内,断死千人。因避暑行亭,见蟪子悬丝面前,公引手接之,成大蜘蛛,衔中指,拂落阶下,化为厉鬼,云来索命。惊讶不已,指渐成疮,痛苦十日而死。<sup>③</sup>

其情况相似“李龟祜”条未标明出处,从写前蜀严刑峻法的酷吏遭受果报的情形看,也应属《王氏见闻录》无疑。再如《广记》卷238“诡诈”类所收“成都丐者”条:

成都有丐者,诈称落泊衣冠。弊服褴褛,常巡

成都市鄙,见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坠文书,求官不遂。”人皆哀之,为其言语悲嘶,形容憔悴。居于早迁桥侧。后有势家,于所居旁起园亭,欲广其池馆,遂强买之。及辟其圭窠,则见两间大屋,皆满贮散钱,计数千万。邻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概呼求事官人为“乞措大”。<sup>④</sup>

该故事《广记》谈刻本误为出《朝野僉载》,现在通行的汪绍楹校本据明抄本,甄别为出自《王氏见闻》名至实归,再用宋人《王氏见闻》“记前蜀事”的特点判定属《王氏见闻录》为确。

《王氏见闻录》通过揭露前蜀统治集团的腐败,指明国运衰萎的原因,有深刻的警示意义。“伪蜀主舅”条(《太平广记》卷136)载:

伪蜀主之舅,累世富盛,于兴义门造宅。宅内有二十余院,皆雕墙峻宇,高台深池,奇花异卉,丛桂小山,山川珍物,无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红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远,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柜,自秦州至成都,三千余里,历九折、七盘、望云、九井、大小漫天,隘狭悬险之路,方致焉。乃植于新第,因请少主临幸。少主叹其基构华丽……

已经贵为蜀后主王衍的国舅,世代富豪尚还不够,他还于成都兴义门修造雕墙峻宇,其修造华丽的程度,连身为君王的少主王衍也大为感叹。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单为了弄一株红牡丹,竟从秦州“掘土方丈,盛以木柜”,历经三千余里的遥遥险途辗转运至成都,植于新第,靡费无数。如此奢侈的统治集团,腐败已经病入膏肓,国家焉能不亡?果不其然,“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据其第”。腐败亡国,给人警示。

《王氏见闻录》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战争频仍、兵燹不断给平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之际,父子骨肉相对竟不相识!“姜太师”条(《太平广记》卷500)写蜀汉时期故事,疑为当时社会写照。姜太师每天鞭捶的掌厩夫姜老,不料竟是自己的生父!在这戏剧性的偶然事件里面包含了平民在战乱中无处安定生息的必然。姜太师虽然用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完满地相认了父子,但他心中所落的愧疚,岂是“斋僧数万”、“终身不撻从者”所能消除的?这个社会历史的责任当然不能由生命个体来承担,这是一个战乱时代所能展示的生命之轻,亲情不保。从王仁裕《玉堂闲话》“康义诚”条(《太平广记》卷500)和孙光宪《北梦琐言》同类小说故事内容看,故事反映的绝不是当时的偶然现象和虚构情节,而是那个战乱时代较为普遍且真实生活的写照。

作者通过调查掌握故老传闻,它们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揭露了统治者争权夺利、互相倾轧造成滥杀无辜的罪恶。“温造”条(《太平广记》卷190)记写唐宪宗时京兆尹温造自请命去南梁(兴元)镇压所谓反叛了的五千名兵士的事件:

……他日,球场中设乐,三军下令,并任执带弓剑赴之,遂令于长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临阶南北两行,悬长索两条,令军人各于面前索上,挂其弓剑而食。逡巡,行酒至,鼓噪一声,两头齐抨其索,则弓剑去地三丈余矣。军人大乱,无以施其勇,然后阖户而斩之。五千余人,更无噍类。其间有百姓随亲情及替人有赴设来者甚多,并玉石一概矣。……

这是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屠杀,五千余军士(还有混杂其间的平民百姓、顶替者)都被无情杀戮,可以想见那是多么血腥的场面,以后若干年,一直成为南梁(兴元)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自尔累世不敢复叛”。这个屠杀事件发生在作者生前半个多世纪,对于他来说“二十年前职于斯,故老尚历历而记之矣。”

《王氏见闻录》中的“金州道人”条(《太平广记》卷85)和“功德山”条(《太平广记》卷287)记写黄巢起义题材,带有神异性质,但不免说明为剿灭黄巢反抗朝廷的力量,无论是安康守崔某还是镇守滑台的中书令王铎都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断然措施。这些作品既具有史料意义,也具有文学价值。值得重视的是该书的作品,记载了物产和地理资源,于文学展示的同时,还再现了博物学和地理学的特殊意义。如“竹骝”条(见于《太平广记》卷163,陈尚君辑云《分门古今类事》卷13引出《益部耆旧传》)记载熊猫类动物的情况:

竹骝者,食竹之鼠也。生于深山溪谷竹林之中无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发地取之甚艰。岐梁睚眦之年,秦陇之地,无远近岩谷之间,此物争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坏城,或自门闾而入,犬食不尽,则并入人家房内,秦民之口腹饫焉。……庚午岁,大梁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叛梁入秦,家于天水。天水破,流入蜀。……蜀人惧之,遂粉刘之骨,扬入于蜀江。……

据此分析,竹骝的形体、大小、生活习性都应和今小熊猫相符(别有论者为今熊猫,但据此形体不类),说明在唐末时期处于秦岭西段的天水(含今陇南部分地区)亚高山丛林分布良好,森林资源丰富,生态状况类似于今四川邛崃山系和岷山山系东南麓,小熊猫有广泛分布,民间对其捕食司空

见惯。至于李茂贞和朱温凤翔之争的“岐梁睚眦之年”,是在唐昭宗天复年间(901-903),其时为什么会有小熊猫“争出”的异常活动,应该是一个历史地理学的谜,而王仁裕把这种事象和政治社会的童谣、史实联系起来,无非是为了增加故事的传奇性和“信而有征”的文学性。

该书称“见闻录”,当属作者耳闻目睹之事的记录,有真实的成分,也不乏虚妄的传闻。但从当时社会的人才观(“蜀士”条)、政治投机思想(“陈岷”条)、冥数前定观念(“潞王”条)、凶兆应验(“骆驼杖”条)、人情世故(“成都丐者”并“文处子”条)等方面,加深了今天以及后世人们对唐末五代初期社会的细致了解,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其中的迷信和和怪诞成分,系其糟粕所在,但并不能降低它所具有的故事价值。

### 三

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内容与情节有不同属性和意义能指。史实提供的只是一个故事,而故事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讲法,这就使得《王氏见闻录》因相似故事而呈现为不同的情节。它基本相同的故事和大致一样的讲法,使得一些作品总给人大同小异之感。王仁裕以史传的眼光,将杂史携带的意义深度用笔记的现实笔法表现,使得小说情节呈现平面化,这种创作的态度使作品表现为美学的平庸。如“成都丐者”条,把故事当作了情节的全部意义,因而失去了超越现实的兴趣、眼光和能力。这篇小说情节不可谓不离奇,但思想却甚肤浅,盖因作者一心一意只在强调“乞措大”的来历和道德劝惩而没有深入挖掘题材的丰富内涵。

道德观念浸入《王氏见闻录》,大体上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叙述层面,这主要表现为作者的议论;再一是情节层面,由情节进程诱导出道德意义,或在道德意义的支配下形成情节。尽管这并不一定代表作品水平的高低,但对于中国读者欣赏小说的审美习惯来看,更乐于接受的无疑还是情节叙述本身。王仁裕历仕五代,在前后蜀即处于政权的核心,这本笔记小说集为今人感受那个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历史意识提供了独特审美体验。篇幅最长的“王承休”条,使不同的人物登台,让他们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时代面对多种矛盾,王承休投王衍所好,“密令强取民间子女,使教歌舞伎乐。被获者,令画工图真及录名氏,急递中送韩昭。昭又密呈少主。少主睹之,不觉心狂。遂决幸秦之计……”对这样的荒唐行为,“由是中外切谏不从。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绝食。”前秦州节度使判

官蒲禹卿叩马泣血表谏，也并不能挽回少主自取灭亡的结局。其独特的审美表现在于，你可以预见败亡之势，你却又不能改变“势”所驱使，是一种政治历史的绝地无奈。而作者加以不动声色的记述，冷静且从容。

如此的情况还有“沈尚书妻”条，该妻被杀，“刃于阶下，弃尸于潼江”，表面看是个人悲剧，性格使然，实则所非。她面对的是一个丈夫可以拥有“姬仆十余辈”的社会，性格缺陷和家庭矛盾造成“诸姬婢仆悉鞭捶星散，良人头面，皆拿擘破损”的局面是必然结果。作者最后用“尸住急流中不去”、“怨偶为仇”的解颐试图淡化悲剧意味，由此展示了著作过程的独特审美表现。

该书鲜明的特色还在于其叙事视角的独特性。王仁裕生活于前蜀士林，他追记整理亲历耳闻事件，为今人考察晚唐五代士人政治心态与社会思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王宗信”条写了十余妓女被胡僧引入火中，但离奇未伤的故事，至终篇，“讫不知何妖怪”，还是没有得到答案。这个故事反映了那个时代士人“诬佛”而又“信佛”的矛盾心态，而申明神道（当然包括佛力）之不谬，几乎就是当时士大夫们最主要的社会思潮。再如“陷河神”条中所写神道的离奇，却是从十六国的前秦开始，至后秦姚萇（南安赤亭今陇西人）游蜀，再到僖宗幸蜀，“其神自庙出十余里，列伏迎驾，白雾之中，仿佛见其形”，以说明神道思想的现实合理性，是在同期作家写秦陇、陇蜀事件时非常独特的。

《王氏见闻录》在艺术上还体现了“史才”与“诗笔”的融合互动。感怀之思，成为五代作家共同的创作情结，王仁裕在这部笔记小说集中的记写也不能例外。“青城道士”条，写“伪蜀青城山道士能幻术”，其淫邪之行，危及豪贵之门，所以“少主不欲彰其恶，潜杀之”。对时世的感怀潜藏在冷峻的叙述之中。这种“史才”与“诗笔”的融合，该书比之诗歌表现更为直接，更为明显，显现一定的人文理想精神。“朱少卿”条写人生的遭际，腾达和落魄都无不应验“马梦之征”，将叙述客观史实与抒写人物情怀结合起来，做到“史才”与“诗笔”的熨帖。

《王氏见闻录》在艺术上表现出一种新变的文体特征。该书现存的30多条作品，无不体现唐末五代史传派小说和辞赋体小说的合流，在小说的杂体化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对后世特定的文体形式产生影响。“王承休”条的蒲禹卿长表在

小说的情节发展上起铺垫和伏笔作用，预示着王衍丧国投降的悲惨结局，这也是其在内容形式上的亮点，它不仅扩大了小说的内涵，而且在小说的杂体化进程中开风气之先。<sup>[3]</sup>因此，该笔记小说集既显史才、诗笔，又带表文，应该是对小说文体发展的一个贡献。“胡翊”条写胡翊的种种事迹，是为后面他的被杀埋下伏笔，写法颇具史传笔法，而后面作者凭吊胡翊的诗作韵文，又体现了赋体小说的特点。“封舜卿”条穿插《麦秀两歧》曲产生的前后经过，乐曲成为关联内容，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对有关音乐题材笔记小说的续写有重要影响。“王仁裕”条属于自传性质，其中题诗放猿（名“野宾”）的情节，由韵文嵌入笔记，叙述与诗赋浑然一体，很好地表现了作品内涵，也显现了故事情节发展的跌宕起伏，与文尾题诗相呼应，很好表现了文体上创新的特点。

总之，《王氏见闻录》呈现史传杂史和笔记小说的共生互动状态，使得其笔记小说文本的写作与阅读成为历史的一种自然延伸。但由于对史实的提炼和深化不够，弱化了对人生体验有新发现的可能性。在我们看到它将笔记小说发展和时代实录交糅一处，体现很多足可肯定和赞赏的文学价值之时，还应当以一种更为宏通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共生互动关系。以往简单地以作品情节为本位的解读方法，使生活（史实）与写作（小说）共生互动的关系变成了从杂史到小说的线性置换，我们可能因此无从把握《王氏见闻录》在二者共生互动状态下的其他认识层面。所以，对《王氏见闻录》版本流传、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表现出来的文史共生互动多层次体察，无疑可以深化我们对它文学价值的重估。

注释：

①见陈见微《辑本〈王氏见闻录序〉》，《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1期；李剑国《隋唐五代小说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陈尚君辑《王氏见闻录》收入《五代史书汇编》傅璇琮等主编，苏州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②本文所引《王氏见闻录》诸条，除注明者外，其余均见于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太平广记》。

参考文献：

[1][宋]李昉.太平广记(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1:895-896.

[2][宋]李昉.太平广记(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1:1837.

[3]温虎林.王仁裕笔记小说《王承休》的文体学价值[J].甘肃高师学报,2009(1):15-16.